

密云县潮河关惨案

王敬魁

长城抗战，日军损失惨重。1933年4月14日拂晓，驻密云县古北口长城一线的日本军队第八师团长西义一，命令100多名日军闯进潮河关村，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进行报复。日军烧了村东头吴子衡家的房子，把部分老百姓集中到街头的四棵大槐树下，一个一个地用刺刀挑死。贾德明一家5口人，被杀死4口，他媳妇被日军杀死以后，10个月的孩子满身血糊，趴在妈妈身上乱哭乱嚎，一个日军把孩子用刺刀挑起，恶狠狠地摔在地上。左英魁一家4口，在家的3口，刚走出家门，就被日军挑死。

没集中到大槐树下的也不能幸免。何国庆起早在菜园子里栽菜，日本兵照他后背猛刺一刀，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就死在血泊中了。李发一家4口人，日本鬼子在街上追上了他哥哥，一刺刀就扎死了。然后又把他父母亲捆在一起，拽到屋内，两个日本兵前后各一人喊着号，一块下手把老俩口挑了。当时李发只有十几岁，鬼子兵对他也不放过，在他身上扎了四刺刀，李发倒在父母尸体旁。日军又把三间房子泼上汽油点着火，狂笑着走了。李发苏醒过来后，忍着疼，从烧着的屋里往外爬。刚爬到外屋台阶，房子就烧落了架。这时候，天已大亮。村西头朱天福一家藏在白

薯窖里，日军进屋见没人，听见孩子的哭声，吼叫着让出来，全家 4 口人，出来一个，被刺死一个。

4 月 16 日，这支惨无人道的日军见到潮河关村残存的房子里还有炊烟，又来“扫茺儿”，把十几个人集合在一起，用手榴弹炸死 3 个 70 多岁的老太太。4 个年轻小伙子躲在赵振发家，日本兵在赵家扔了手榴弹，赵家 8 口人只剩下 3 人，其余都死了。李才家两口、魏廷杰家 4 口，都被日军刺死。李发看见日军就跑，日军随后就追，开枪把他的棉袄打了几个窟窿。李发跑到下甸子村东沟里，又遇上鬼子的飞机扔下的炸弹，掉在地上没炸，总算拣了一条命。李发的伤流了半年脓血，伤好后留下几个碗大的伤疤。

日军“扫茺儿”以后，幸存者逃到外地，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村里的尸体任饿狗撕啃。饿狗吃红了眼，见外村的活人也敢撕咬，当地人只好见狗就打。过了十多天，尸体臭味难闻，无人掩埋，中国军队 17 军 25 师派人请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人，到这里埋葬了尸体。这一年，全村的土地荒芜，村庄内长了一人多高的蒿草。

这个仅有 80 户人家，400 来间房屋的小山村，在日寇一手制造的惨案中，有 83 口人被杀，360 多间房屋被烧，200 多头牲畜被烧死。

这是日寇进关后的第一起惨案。

【作者简介】王敬魁，密云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副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在古北口修铁路

李善文

1936 年以前,北平的火车向东只到通州(通县)。由通州到古北口的唯一一条大路,是清朝皇帝到热河离宫的那条 3 米左右宽的土御路。1933 年古北口长城抗战之后,日寇垂涎我华北、吞并我中华的野心更加强烈。而通州到古北口的交通状况,又制约着日寇实现其战略意图。为此,日寇急急忙忙抓紧修筑“通古铁路”。

通古铁路由“满洲”铁路局负责。1936 年 8 月开始勘测,9 月便全线开工。1938 年 2 月全线接通,4 月 1 日通车。从此,北平的火车可直通到所谓“满洲国”界古北口了。这条铁路在密云境内共有五个站,除古北口火车站由锦州铁路局管辖外,其余下会、石匣、小营、密云四个站均由满铁北京铁道事务所管辖。

参加通古路修筑的日本商社有罔组、鹿岛组、大林组等。全线开工时,共征用中国劳工 12,000 余人,有当地农民,也有从东北各地抓来的。当地劳工由各乡(村)保长摊派,年龄 21 岁至 25 岁之间,男青年。每期 15 名至 20 名,每期 10 天。开始时由日本小龙公司付给每个劳工每日 4 至 6 角伙食费。伙房由各村自立,只管劳工吃饭,其它一概不管。好的伙食,劳工们可吃到小米、玉米面,但副食也只是白菜汤、萝卜汤,连咸菜都没有。劳工行李亦是自备,家庭宽裕些的能带条棉被,但大多数拿不出棉被。许

多村都是二三人伙盖一条棉被。劳工们干的主要活计是用荆条筐抬砂石料，每筐装 200 斤左右。当地劳工都是庄稼人，活计虽然繁重，能吃饱，又有定期轮换的指望，所以跟监工的日本人、高丽人发生冲突的不太多，也没产生过大的反抗行动。苦的是那些外地劳工，他们吃不饱，又没有轮换的指望。吃的主要是红薯。活计重，没有休息时间。动作稍慢，非骂即打，各工地不断发生抗议、罢工事件。为了抓紧工期，日寇对劳工采取高压手段，对领头闹事的民工，大多是半夜里秘密活埋。

在密云，我访到了两位当年修筑通古铁路的老人。一位是密云白河岸边李各庄村的张凤一，清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生，在沙河铁路大桥挖过桥墩。第二位是梁御臣，民国 4 年（1915 年）农历四月生于河北丰宁旋家营子，原籍良乡，现住密云镇小南门村。梁父叫梁志邦，京戏艺人，艺名山翠。梁家全家唱戏，梁唱娃娃生，梁姐梁凤仙唱青衣。1930 年，梁家在密云荆子峪落户。梁御臣念过私塾。21 岁时即 1936 年随父唱戏，不能糊口，又返回荆子峪村种地。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被保长张永明派劳工到古北口为日本修铁路。下面是张、梁二位老人的回忆。

张凤一回忆说：当时我们全家 5 口人，种 10 亩薄沙地，生活很苦，平时靠给人打短工度日。铁路从李各庄村穿过，铁路桥修了三年。河套搭满了帐篷。第一次把桥修在现在铁路桥的下游约 200 米的地方。桥身不高，到雨季，桥好像浮在水面上。民国 28 年（1939 年）发大水，桥被冲毁了。第二年（1940 年）又重修时，选到现在的位置，从李各庄村东的山脚到沙河村西的山脚，比原桥高出四五丈。当时孩子们编顺口溜说：“小日本瞎胡闹，来到中国修铁道。”

修铁路桥打桥桩时，先在河心竖起一根两丈长（6 米）、一丈粗（3 米）的水泥管，水泥管四周用砂袋把水圈开，人在管中挖砂石，管口上搭木板，装有轱辘，下面挖满一筐，上面的两人就把

筐绞上来。砂石加水，一筐足有 100 多斤。水还在淌洒，管下干活的人，就如同在水里泡着，又累又凉。绳子较劲儿，吱吱直响，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拉断，十分危险。在管下干活，这筐才绞起，又得装下筐，甭想抬头看看，躲一躲。我当时在从西往东数第 13 个桥墩下干活，是保长派的工。没干几天，我看太危险，赶上井换班时就逃走不干了。日本监工抓不到我也没办法。

梁御臣回忆：1936 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保长张永明派我到古北口修铁路。那次要的是 20 到 25 岁男青年，共 15 人，与本区公所管辖的庄头峪、上峪、娄子峪、碱厂等五个村，共 100 余人，编成一个大队。荆子峪领队的是我姐夫张玉文（我姐迫于生计嫁给了富户张玉文）。行李自备。我村只有我及其他三几个人有条被子，其余十来个人都是空手，家里拿不出棉被。我们起早步行，天还没亮就动身了，走到太阳落山才到古北口，足有 100 里路。一路上，日本汽车乱窜。汽车门有的写“大钢组”，有的写“大华”，都是中国字。写“大华”字的车是从密云沙厂、二道沟拉金矿石的。汽车开得飞快，爆土狼烟，一路上我们总得给汽车让路。路边上，路中心，被撞死的毛驴和羊不断，撞死就撞死了，车连站都不站。车稀时，畜主还能拖出死牲口得点肉吃。有时一辆接一辆的车，牲口被轧成肉泥。那年月，日本汽车气势汹汹的，比在自己家还“仗义”，蛮不讲理。我们一路上提心吊胆，领队的直嘱咐我们：“小心，躲车！”“你比驴还经撞？小心跟羊似的，成了肉饼！”

我们走到古北口，住在离令公庙不远的一家德顺老店里。荆子峪的 15 个人挤在北上房一条大联炕上。我们村的伙房也安在店里。这天晚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小米饭。张玉文家有钱，带队也管出工，第二天他给大家报了到，给每人领只袖章，他就回家了。后来听说，我妻沙素珍见张玉文回家就急了，质问张为什么把我一人撂到古北口日本人手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饭，按要求把宽五寸、打着红印的白布袖章戴在左臂上，报了到，接着就干上活了。我村劳工能忆起名字的有张洪福、张起海、张玉润及沙德州等人。管我们的工头是个东北人，大高个子，东北口音很重。到工地以后，我们 15 个人就被分开了。有的和水泥，有的抬砂子，有的抬混料。我和张玉润一组，到潮河滩抬卵石，垒护坡坝（用铅丝编网，把卵石装在网里作护坝）。干活用的工具由小龙公司收发，小龙是日本人，我未见过。我们用的是荆条编的大筐，能装 200 多斤，筐系是铅丝的，抬杆是根杨木椽子。抬一个来回有 2 里来地，半天得抬十四五趟。每天摸黑起床，吃完饭到工地干上活，刚能看清人的模样。午饭有时回店里房所去吃，有时送到工地。晚上天不黑不收工。一天里，除了吃饭是休息时间，没有中歇，没有水喝，大小便都得偷着。

修古北口火车站分两个工地。我们修坝的是一个工地，另一个是修站台的工地。那里日本人、高丽人监工的多，来回巡视。工地上黑鸦鸦一片人，至少有千人以上。

我们每天出工必须戴袖章，既是劳工标志，也是通行标志；不戴袖章出入古北口城门非常困难。我们每天出工、收工，都见到许多过路人因无袖标，或被吊在城门旁边药王庙的窗户上，或贴墙根站着，或跪在城门两边。

古北口街上，日本宪兵、“满洲”警察、中国警察、海关、税局、警备队、保安队，这拨来，那拨走，有的还拉着狼狗，监视着劳工。劳工们就跟牲口一样闷头干活；整个工地，除了监工吆五喝六有些人声以外，其余就都是工料撞碰发出的声音了。

在我们之前，农历九月，保长张永明派过一期，20 人到大石岭至穆家峪修路基。我们这期已是第二期了。原说是 10 天换班，可我们干了半个月也没换。我们 15 人中，张玉文带班，他走后也没人管。我父亲唱戏不能养家，饥病交加，头年腊月故去。我父

亲周年将到，我在古北口很着急，晚上睡觉前，我跟大伙说，父亲头周年到了，跟大伙请个假，我得先回家了。因为我是当村姑老爷，都碍着面子，没人说行，也没人说不行，更没人去报告。到第二天，大伙还没起床，我就扛上行李卷回家了。我离开古北口时，火车站模样已经能看出来。

干活时，我总想，再累也得挺着，¹⁰天工夫一咬牙就过去了，家里孩子、老婆还指望我吃饭，无论如何也得落个囫囵身子回家。干活时什么也不想，就想吃口咸菜，伙房每天只给菜汤，从家带的两个咸菜疙瘩，不到两天，就让大伙你一口他一口地啃完了。

比我们更苦的劳工是东北过来的那些人，一个个老长的头发，瘦得皮包骨。吃饭时只见他们每人就两根红薯，一桶盐水，连根菜叶都没有。逃跑的、罢工的不断出现，那些领头的，都被宪兵队活埋了。我妻沙素珍在家里听到的消息比我在古北口听到的还多，所以很后怕。为这事，跟姐夫张玉文的关系一直不融洽。

1941年以后，荆子峪因在火车线上，越来越不安宁。日寇经常到农村抓夫要青年。在农村识字人少，每次我都在应征之列，而且，因我唱过戏，世面见得多，跑得远，日本对我特别注意。我感到在村里混不下去，就全家迁到密云县城了。

张、梁二位老人现在都很健壮。张凤一解放前后一直务农。1993年10月19日我去访问老人时，老人正在场院看场。当我请老人到他当年修过的桥墩照个相时，老人还说，距离不远，可不能时间长了，场院不能离人。老人十分认真负责。梁御臣老人则有另番经历。解放后他一直当村干部，直到1964年“四清”时。后在村里承包菜田，收入颇丰。现因菜田被征用，老人在家颐养天年。谈起往事，老人说：“对日本人修铁路，当时并没想过什么，就是不愿当劳工，特别是给日本人当劳工，家里人怕出事，自己担心回不了家，可以说从老到幼、从街坊到亲戚，人人反对，但征到头上了，只能硬着头皮去。到七七事变之后，才慢慢看明白

了日本加紧修铁路是为了进攻中国。那时连夜施工，有的地方铁轨才铺上，火车就跟着过来了，车上不是日本兵就是坦克、大炮。到 1938 年，日本修铁路更加迫不及待了。在当时，甬说我还念过几年书，连目不识丁的庄稼人也看出了日本加紧侵略我们中国的野心！”

【作者简介】李善文，密云县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

（密云县政协供稿）

大井村日军仓库和“万人坑”

杨 斌

我住的大井村,是广安门外的一个小村。可人们都说这是块风水宝地,是九省御路,凡是外省市到北京城来的,以及从北京城里到外地去的,都得从这里经过。就是修了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之后,车马、骆驼也是头尾相接,昼夜不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丰台、大井一带沦为日伪统治区,日本军队强行围占了丰台以西、大井以南的大片村庄,其中程庄子、马茶馆、李庄子、周庄子、孙庄子、王庄子等 12 个村农民的房屋,100 多顷耕地,全部被强行征用,动工兴建军用仓库。失去耕地的农民,只得流离四方,另谋出路。

修建这座华北最大的军用库区,是要大批劳工的,于是四面八方的谋生人群涌向这里。大小包工头各树一帜,有的带领上百人,有的带领十几个人,加上流离失所的农民,为修库区提供了劳工市场。有的挖掘沙石,有的贩运沙石,有的直接出卖劳力。大井村也在畸形发展,小小的村庄,因临近库区,先后出现 27 家小客店,说是客店,无非院里有几间破房,给劳工一个睡觉的地方,条件的恶劣,是可想而知的。住在小店的劳工劳动一天,回来还要自己生火做饭。大井村边有个“人市”,是历史上形成的劳工市场,在大井东头的皇亭内,每天都有上百的劳工在那里找活儿干。许多有农活专长的劳工,为了多挣点钱,也到“人市”上来揽活

干。想雇工的人在天亮以前赶到“人市”，买卖双方按照活茬儿要求，工资多少，都认可后，劳工即随雇主去干活儿。这个“人市”每天总要有很多劳工找不到活儿干，剩余的人就成了修仓库的廉价劳力。为日军当工头的汉奸，到“人市”上一招呼，谋生的人群就随之到库区干活儿。当时我们管这叫“打洋短儿”，一天的工资，甚至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

大井村西、村北有不少挖沙石留下来的废坑，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随着挖沙石的增加，沙石坑也在增大增多。在村北不到半里的地方，有一个方圆近 3 亩地的大坑，日久天长，这里就成了无主坟坑，埋的死尸多了，人们管它叫做“万人坑”。可这里真正埋死人最多的年份，是 1943 年，万人坑成了名符其实的万人坑。

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推行“强化治安”，待到“第五次强化治安”时，老百姓手中的粮食几乎被“征购”光了。春天到来，青黄不接，无以为生的农民，有的到张家口逃荒，不想背井离乡的农民把种子吃光了，再挖野菜，摘树叶……凡是能填肚子可吃的东西，都成了活命的宝物。市场上很难买到粮食，代替粮食的是“混合面”。昔日被当做饲料的高粱、豆饼、豆腐渣，成了人们最珍贵的食物。这时，到库区“打洋短儿”的劳工猛增，有本地人，也有四乡来的，为的是进到库区，在喂马的饲料中拣块豆饼吃，或者在马槽中抓几把马吃剩下的高粱充饥。

这些劳工从早到晚地干活，回到家食不饱腹，衣不裹身，饥寒交迫，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活命，他们想出许多对付日本监工的办法。例如，当工头监视不到的时候，就停工不干，我们都管它叫“磨洋工”；但稍一失神，还会遭到工头的毒打。后来，大家伙儿一串通，组织起来，专门找人看着监工的工头，工头一露面，就举起手里的家伙示意，大家就干活；等工头一走，还是照旧“磨洋工”。这样虽然少消耗些体力，但是饥饿仍没法解决，

偶然拣点豆饼，吃后腹胀；喝了生水，又泻肚，病倒死亡的现象开始发生。劳工死后，日寇就让他们用排子车把尸体拉到“万人坑”草草掩埋。

这年春夏之交，瘟疫横行，没等麦穗发黄，许多在大井仓库“打洋短儿”的农民就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当时的老百姓最怕日军在谁家的院墙上撒上白灰面，一撒白灰，就是被认定是“瘟疫区”了。附近大瓦窑村一家姓刘的农民，一个星期之内三个孩子先后死去，做母亲的都吓傻了。在公路上，一个人好好的往前走，突然向前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这样死去的人，一天不知出现多少。最可怜的，是在库区里的劳工，一旦呻吟倒下，就被看成“霍乱”患者，不加任何治疗，就被拉到“万人坑”。住在小店的劳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不管是不是“霍乱”患者，只要病倒，准被扔进“万人坑”。

“万人坑”方圆近三亩，早已尸骨累累，成了难以数计的人们的坟丘，甚至无法再向地下刨坑。埋到这里的尸体，不用说棺材了，就是有块破席裹着就算不错。成群的野狗，在这里找到了它们的“天堂”。刚刚拉到坑里的尸体，就被野狗围上来，横拉竖扯撕碎，野狗争相抢食的情影，真使人胆寒。

如今，噩梦早已过去。当年的“万人坑”，今天已经被大井的农民建起了汽车修配厂。但是像我们这些 70 岁左右的老人，一想起这“万人坑”，就好像看到当时日军指使“乡丁”拉运死尸和野狗撕啃死尸的情景。但愿青年人不要忘记这段血泪史。

【作者简介】杨斌，原大井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 霖 邢锦堂整理
(丰台区政协供稿)

大兴县济德堂惨案

邢友廷 王观凤

1937 年 7 月 27 日下午 3 时许，日本侵略军 20 师团在师团长川岸文三郎中将指挥下，向驻守团河的 29 军某部发起进攻。为增援南苑急驰而来的 29 军 132 师，在赵登禹师长指挥下，与守军一起投入了保卫团河的战斗。激战至傍晚，守军向南苑撤退，日军占领团河。当时，团河驻有 29 军办的一个残疾人工厂，工人都是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 29 军士兵，共 200 多人。日军占领团河后，把这些残疾人都赶到团河行宫北门外，然后用机枪对人群进行扫射，200 多人无一幸免，全被杀死。

天黑后，日军将抓来的 18 名青壮年农民押到济德堂^①，为躲避日军而藏身这里的团河村青年农民于治久，也被堵在这里。日军将抓来的 18 个人关进一间封堵得很严的屋子后，就逼着于治久给他们做饭吃，大米饭蒸了一锅又一锅。

当时正是伏天，关在屋子里的 18 个人，被日军强逼着坐在滚烫的热炕上，更加闷热得喘不过气来。

28 日清晨，吃饱睡足的日本侵略军，将于治久和那 18 个人带到一起，逼着他们解下裤腰带，然后，用这些裤腰带将他们一个

^① 济德堂是清末北京城九门提督江朝宗为照管在海子里的土地而建的一处庄子，位于团河行宫北约 1 公里处。

个捆起来，每个人有一名日军押着，出了济德堂南大门。来到一块瓜地边，日军让他们面朝北，排成东西一行，站在瓜地里。每个人的对面，站着一个持枪日本兵，枪上上着明晃晃的刺刀。站在于治久对面的是一个日本军官，他抽出雪亮的指挥刀，狂喊了一声，日本兵端起枪向站在面前的农民身上刺去；日军官也抡起指挥刀，从于治久头部左上方砍下来。19个人都倒在了地上。

天黑后，于治久慢慢苏醒过来，用了很大力气，才看清左肩部被砍了一道大口子，有三指多深，肉往外翻着。再看周围，那18个人一个个肚破肠流，全都死了。他咬着牙，用一件单衣连塞带缠地裹住伤口，爬进济德堂院里，在牲口棚找到半缸碴子凉水，喝够后，歇了很长时间，挣扎着站起来，一步一个血印地走出了济德堂。找到妈妈后，在妈妈的细心照料下，一年半后，他的伤口才慢慢愈合起来。从此，于治久落下了终身残疾。

【作者简介】邢友廷、王观凤，《大兴县志》办公室干部。

（大兴县政协供稿）

昌平区西山惨案

李长富 王宏士 李志江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板垣征四郎部沿平绥铁路向西北推进,8月初日军进犯至南口,受到了南口国民党守军汤恩伯第十三军的英勇狙击。日军先后调遣铃木第十一混成旅团、酒井第一混成旅、川岸第二十师团及板垣第五师团,总兵力7万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武器的掩护下,对南口守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我爱国官兵凭借居庸天险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一次次打退了日军攻势,至8月中旬日军仍久攻不下,使其“三日内攻下南口”的计划被打乱。在正面受阻的情况下,日军采取了迂回战术,分兵一部,由昌平西峰山进入西山,经溜石港、马刨泉、禾子涧、镇边城、横岭、沙城绕至南口中国守军背后进行攻击,企图使中国守军腹背受敌。日军在实施迂回作战计划中,对沿途百姓实行了“三光”政策,制造了昌平西山惨案,对昌平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8月18日,日军进入居住着150多户人家的溜石港村,以找回丢失的枪支为借口,开始对百姓进行血腥屠杀。村子里顷刻间枪声不断,火光冲天,大人喊,小孩哭。

村民刘万丰一家7口被日军残杀。日军进村时,刘万丰的媳妇和嫂子搀扶婆母,拉扯着4个幼小的孩子向村外逃去,刚走到村东头,就被日军发现,将7人赶至村东头山梁一棵杏树下全部

杀害。刘母死时 70 多岁，最小的孩子 6 岁。刘万丰的媳妇死得很惨，被枪杀后，日军还将其乳房割掉。村民王福臣被日军抓住，吊在井旁的杏树上，扒光了衣裳，用刀一刀一刀地活活地剐死。有两位外村双目失明的老人住在溜石港村女儿家，也未逃脱厄运，双双惨死在日军刺刀之下。日军进村后第二天，躲藏在山里的王永喜想回家看看。当他快走到村子时，被日军发现，日军把他当作枪靶子，打死在田地里。这一天，日军在溜石港村共屠杀无辜百姓 37 人，烧毁房屋 440 多间。

8 月 19 日，日军从溜石港向西开进了马刨泉村和老峪沟村。在马刨泉窑皮子上边的一个地方，日军抓到了张景宽、田明香、刘士全和张进瑞，将 4 个人用绳子捆在一起，带到一个叫海棠树坑子的地方，用刺刀一个个扎死。60 多岁的老人刘万江，来不及逃走，藏在了自家佛龕供桌下，被日军发现挑死。田珠山一家，在日军进村前，躲到一个山沟里，带的粮食吃光了，晚上想回家弄些吃的，当他们走到村边地里时被日军抓住，用战刀活活砍死。贾志通和他的儿子贾长春死在一起；刘大栓板、刘二栓板兄弟二人一起遭日军杀害。日军在马刨泉村共杀害百姓 43 人。其中年龄最大的 70 多岁，最小的 20 岁。日军临出村时还放火烧毁了数十间民房，抢走了牲畜几十头。日军走后，村子已经不像样子，全村哭声震天，惨不忍睹。

日军血洗马刨泉的同时，在老峪沟村同样进行着野蛮的杀人行径，共屠杀百姓 16 人。8 月 20 日，日军进入禾子涧村，共残杀当地群众 13 人。仅 3 天时间，日军在 4 个村就残害无辜百姓 109 人，烧毁房屋 500 多间。

【作者简介】李长富、王宏士，昌平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李志江，昌平县政协文史办公室干部。

（昌平县政协供稿）

老 峪 沟 血 泪

陈宝厚 李树全 崔宝山

老峪沟村地处深山，位于昌平县城西北 50 公里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兵一部向西北推进，8 月 19 日，日军攻到老峪沟村对百姓进行了血腥屠杀。

日军进村时，大部分百姓都已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一部分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人惨遭日军杀害。村民王进海在放牲口的途中被日军抓住，两个日本兵用绳子将其倒背着双手捆绑起来，凶狠地举起铁镐猛砸他的头部，王当场倒在血泊之中，他们还不甘心，又向其背后猛砸一镐，然后狂笑而去。过了很长时间，王进海渐渐苏醒过来，感到头部背部剧烈疼痛，他咬着牙挪到地阶旁，蹭断了绳子，用手摸摸头部，满手都是鲜血，脑后凹进一个坑，鲜血还在往外流。他担心家中也发生意外，强忍剧痛，跌跌撞撞地偷偷逃回自己家，走进院子时，听到屋里有动静，他悄悄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大吃一惊，只见屋里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都是被挑死的，炕上地下到处是血，屋里散发着血腥气味。其中一人还没有最后断气，正断断续续地喘着气。这个人是外村人，到本地来做活，还没有来得及逃走便被日军抓住，捅了一刺刀。王进海连连唤了几声，那人慢慢睁开双眼，一看是王进海，便说：“人都死了，你父亲也被挑死了，可能被日本兵抬到了后院，一会儿他们还会来抬人，你赶快逃走吧……我死后，请您给我们家捎

个信儿……”王进海含泪离开了自己家，逃进了深山。日军走后，他回到家，只见被害人的尸体包括自己的父亲已被日军扔进了地窖，大小 7 口人，其中 6 人是被挑死的，有韩坦、崔德瑞等；有一个 70 多岁的老人（杨万长）是被开枪打死的，日军进村时他躲到了王家的柴垛后面，由于年老咳嗽不止，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看到父亲惨死，王进海失声痛哭。院子里有位妇女抱着婴儿也已哭得悲痛欲绝，原来日军进村时，她抱着婴儿躲到了王家屋后一个土洞里，用荆条挡住洞口，由于婴儿啼哭被日军发现，一个日本兵举枪便向洞中打了一排子弹，婴儿当场被打死在母亲怀中，其母侥幸没被打中，才免遭杀害。日军走后，这位妇女抱着孩子走出土洞放声大哭。王家院遇害百姓大小共 8 口人。

与此同时，崔姓两家 7 口人也惨遭杀身之祸。有崔德安、崔德力、崔仓头、崔良头、崔黑头、崔久头、崔群头。有的被害在家中，有的被杀在田地里。崔德安被日军用战刀砍掉了头，当天正赶上天降大雨，他的头和尸体被洪水冲走了很远。8 月 20 日，日军又将一个名叫陈宝环的人无辜杀害。这样，8 月 19 日、20 日两天，日军在老峪沟村共屠杀无辜百姓 16 人。

日军不仅残害村中百姓，还两次纵火焚烧百姓房屋。第一次是 1938 年 3 月 20 日，一队日本兵突然闯进村中，不问青红皂白，挨家挨户放火烧房，顷刻间，村中浓烟滚滚，大火冲天，烧毁房屋 300 多间。第二次是 1940 年春天，日军又放火烧毁百姓房屋 200 多间，东台（地名）、沟里头（地名）两处百姓房屋及财产被烧的片瓦不留。日军的暴行使百姓无家可归，受尽了痛苦。

【作者简介】陈宝厚、李树全、崔宝山，昌平县老峪沟乡老峪沟村村民。

李志江整理
(昌平县政协供稿)